

方城简易乡村师范始末

鲁 开 泰

我之所以要采写《方城简易乡村师范始末》，是因为这所学校在方城的历史发展中，曾经产生过相当重大的影响，有一定的历史地位。该校前后存在二十余年，培养出学生五百余人。他（她）们遍布城乡，对方城小学教育的发展，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生活艰苦，在那所谓“金仓库，银乡镇，小学教员没人问”的黑暗岁月，他（她）们坚持教学，耕耘不辍，难能可贵。特别是乡村教师，他（她）们抱着吃不饱的肚子，站在低矮的茅屋下，教孩子们识字，计数，高唱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”想来何等神圣！当然也有一部分毕业生，后来离开了教学岗位，走上政界、军界、商界。在方城的各界里，尤其乡镇基层政权中，差不多都有该校毕业生立足。他们的情况并不一样，作用各不相同。其中也有变得非常贪婪反动，喝足了人民血，发够了国难财的。但这毕竟是极少数。

更为主要的是，该校具有传统的革命精神。远在1932年春，就曾在1929级的毕业班中发展了一批党员，建立过党组织。1938年抗日救亡高潮中，又重新在1935级毕业班上建立起党支部，开展过火热的斗争。还有一些早已进入社会的前期毕业生，也在这期间入党，打入国民党的各种组织、团

体，进行活动。这些不同时期入党的同志，在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，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尽管有部分人落荒掉队，但大部分坚持了下来。直到今天，这些幸存的，已是垂暮之年的老同志，始终不忘革命初衷，犹默默地为新的历史时期作奉献，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。这所学校1947年方城解放时已告结束，师范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，但她的传统革命精神应当永存，这就是我采写《方城简易乡村师范始末》的根本动因。

方城师范教育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1918年在黄学开办的一期简易师范班。而县立简易乡村师范，则创立于1925年，专为培养小学师资而设，原名初级师范。1933年，国民党政府为使小学教育从城镇向乡村普及，始改称“简易乡师”。当时方城境内，除有几所小学，这所唯一的简易乡师便成了“最高学府”。

中国自从隋文帝开皇七年（587年）设科取士，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，直到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，为挽救颓势，逃避死亡，推行所谓新政，通令各省府州县把准备科举的贡院、书院，一律改为大中小学堂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九月，经袁世凯、张之洞奏请，始明令“废科举，兴学校”。方城“兴学”起步较迟，仅在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九月，设立了一个“兴学”机构——劝学所。所长张端如（子玉）、劝学员袁寿田（介安）、李东旭（从吾）、李松鹤、翟子玉。所址节孝祠（实际在城隍庙道士院办公）。与此同时，还成立了一个教育会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

年），劝学所、教育会合并为教育宣讲所，所长马毓麟（善卿）。这些先生们在整整五年的劝学、宣讲中，成效如何？不得而知，只知辛亥革命前，方城并没“兴”起学校，而把书院改为“高等学堂”，乃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。

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春，方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。高等学堂就是高等小学。根据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“壬子·癸丑学制”，修业期限为三年。书院改办学堂，无疑是方城教育史上的一次变革，尽管高等学堂还没完全屏弃旧学，甚至明确规定，招生对象必须通晓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师生的后脑勺上大都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，但对开办近代学校来说，毕竟有了一个开端。高等学堂前后共招收十班学生，到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最后一班学生毕业，按照新学制（壬戌学制），黄学办起完全小学，高等学堂便停办了。

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金介甫和朱正庵，曾在黄学明伦堂开办蒙养学堂，也就是初等小学。由于在办学中初步认识到了培养师资的必要，便于次年（1918年）在蒙养学堂办了一班简易师范。教师朱济五。毕业学生不足二十人。这是方城最早的一批师范生。后来在黄学完全小学执教多年的老教师高吉甫，就毕业于这个班。这班师范生毕业后，曾在方城城厢办起三十个单级复式国民学校，对方城国民教育的推动，起了积极作用。

方城举办正规师范教育，是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春创立的二年制初级师范。校长王明扬，外地人。第一届招生一个班（以后每次招生都是一个班）。这年夏，有个名叫张阿卿的考生，在校门口张贴“大字报”，辱骂王明扬，

说：“方城县立师范，请个校长王老鼋。不廉财，不办公，来把方城士子坑。暑假后，讲仁义，来把方城士子欺……。”据说这个考生，旧学颇有根底，又有一笔好写，不知怎的竟名落孙山外。眼见得是心怀不满，发泄私愤。王明扬的为人及办学能力究竟如何，已不可考，但知他所培养的这班学生中，虽然有不少后来都成了方城地方的头面人物，但坚持在教育界的却为数寥寥。只有杨廷祥（兰卿）和孙廷相（树青），算是从事教育较长久的。杨兰卿，一直任小学教师，直到晚年。孙树青很有事业心，曾创办新裕中学。方城原来没有中学，1934年冬，李荣庄在节孝祠创办了第一所私立裕州中学，由于经费无着，只办了一学期就停办了。紧接着孙树青在书院创办私立新裕中学。这所中学以方城的一些财主作校董，经费较为充裕，师资水平较高，有一定图书仪器。孙树青治校有方，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，有的毕业生曾考入省立高中。只是抗战开始后，他抱着抗日的愿望，投笔从戎，参加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，才离开教育界。然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，并没让他去打日本，却派他打入延安刺探我党我军情报。孙树青在延安受到我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，并学习了一些革命知识，思想发生变化。他曾写信给家里，要家人全部把土地卖掉支援抗日。他的地主家庭，对于不要土地自然难以接受，甚至在乡里传为“奇谈”，说孙树青被“赤化”了。孙树青离开延安，便回到家乡，对民众运动颇为热心。1939年，笔者随别廷芳的南阳抗敌自卫四团政工人员席子鹤等赴内乡天明寺，路经镇平，邂逅袁宝华、米醉月，袁宝华在同我们谈到民运工作时，还问到方城的孙树青。当然，孙树青由于阶级局限，没有真正投入革

命，与世浮沉了若干年之后，解放时不得不把自己放在革命的对立面亡命他乡。

初级师范只办了一年多，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春夏之交，因樊老二打方城，便中断了。王明扬也随之离去。

学校恢复，已是三年后的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。这期间，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，土地革命兴起，北京军阀政府垮台，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，方城县在高喊一阵子铲除土豪劣绅之后，也已归于沉寂，挂出了国民党县党部招牌。国民党开始反共，便开始反动。但它新攫取政权，其腐败程度终究没有后来为甚。重视教育，恢复初级师范，不能不说是它的一大政绩。这时城隍庙推倒了神像，成了师范校址。前院是附属小学，后院是师范，再后院是学生宿舍，宿舍后有一个很大的操场。恢复后的方城初师，逐步走上正规。自1929级开始，学制改为三年。实际上1929级学生，整整读了三年半，从1929年春，直读到1932年秋。初级师范招收小学文化，但入学学生的实际程度，都远远高于小学。如王炎升，由于家学渊源（父亲王贺是戊戌进士），文史知识已有相当基础。再如王伟昌（景宏）、马芳萼（岚轩）、李重华的数理，聂楚峰的画，都已很有根底。整个说来，这个班的文化素质和教学质量，是历届各班较高的。而且和上届不同的是，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从事教育。象王欣亭、王子安、王道三、杨蔚亭、牟子方、马兰轩、王景宏、周奎先等，解放前差不多一直教书。解放后王道三还任方城师范教导主任多年，终生从事教育。就是一部分后来转入其他各界的毕业生，开始几年也多在各小学任教。当时方城小学师资缺乏，教学质量普遍不

高，1929级学生毕业时绝大多数充实各个小学，从而使方城小学教育大有起色。有人说，这届学生为方城小学教育竖立了一座里程碑，并不过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厢一小（即黉学完全小学），1932年秋季起，青一色由这班毕业生充任教师，他们既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气，又有真才实学，教学认真，管理严格，再加当时校长王新拳富有办学经验，直把一所原来死气沉沉的一小，办得生机盎然，严肃活泼，教学质量大为提高，校风为之一变。

办好学校最关键的是校长和教师。初级师范恢复后的第一任校长是金如玉，本县人，回族，绅士，根本不懂教育，把学校搞得乱麻一团，学生对之异常不满。不久就换了邓县人张霞飞。此人年轻有为，很有魄力，有口才，特别能讲，颇受学生称赞。只是度量不大，因和一位音乐教师阎阔亭发生口角，竟愤然离职。接替张霞飞的是连理清和袁咸甫。连理清，本县赵河人；袁咸甫，城东安庄人。他们是当时联系青年、主张廉政的新派核心人物。二人先后担任校长。连理清很有才华，能言善辩，敢说敢干，很想在方城有一番作为。他1940年春重任校长时（这时师范已与新裕中学合并为县立中学），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文洲对立，后为杀手张七将其暗杀在住家门口。当时袁咸甫任教导主任，对连理清之被害，悲痛异常。袁咸甫后为方城三青团主任，解放后被镇压。有说他曾参加共产党，在煤矿搞工运时叛变，因出卖同志而被镇压。但有人说他根本没参加过共产党。其说不一。既行镇压，必有其应得之罪，这里不作详述，只说他们在任师范校长时，还是有所建树的。连理清治校很严。学生孙廷璋，行为恶劣，经常迟到早退，还在校外私自为人写“呈

字”(即诉状),为非作歹,招事惹非。有次迟到,被连校长碰上,当即张贴布告,给予记过处分,全校震惊。在连理清任职期间,教学秩序井然,校风大为改观,成为建校以来最佳时期之一。连理清升任教育局长后,袁咸甫接任校长。袁咸甫任职时间较长,1929级之后,改为秋季始业,从1930级、1932级、直到1933级改为四年制简易乡师前,都是袁咸甫担任校长。他一面任校长,一面仍然教授数学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曾亲自带领1929级学生赴开封进行毕业参观实习,并和连理清一起研究对这届学生的毕业分配,对方城小学教育的推动,作出了一定努力。

初级师范的教师,水平一般较高,多为大学程度。语文如王粒民,历史如袁恭甫,地理如周吉甫,新文学如何珊洲,数学如靳德甫,教育学如陈昌明,都是佼佼者,深受学生拥戴。王粒民是前清秀才,博学广识,汉语根底特厚。学生们喜欢找一些冷僻字向他请教,意在难为老师,但他都能从容不迫地解说出读音、字义、用法和例证,从没被难住过。他曾说:“一般国文教员最多只识得八九千字,我认识的汉字约在万字以上。”王为人态度和蔼,平易近人。他选编的古诗词及鲁迅小说等讲义,为学生所喜爱。何珊洲又名闪骤,曾在省垣开封报刊上以“高流”笔名发表文章。他除讲授课本,还向学生推荐课外进步书刊,并印发“读书报告表”,让学生将逐日所读课外书籍,如实填报,每周由班长收集送他审阅加批,缺误者予以训斥。在何老师的推动下,学校还办起了小型图书馆,帮助同学课外阅读。他鼓励学生“卖田买书”、“拼命读书”,一时间学校形成读书热。当时,

在教学课程中，还设有国民党的所谓《党义》课，由县党部书记长讲授。前面曾说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文洲。杨文洲，名士瀛，字文洲，他原是学校的体育、音乐、美术教师，年少精干，体魄强健，擅长武术，不以老师自居，能和学生打成一片，在他的住室里学生常满。后来他投靠国民党，登上政治舞台，做了县党部书记长，又当了中牟、正阳县的县长，还被选为“国大代表”。全国解放时，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，现在台北定居。

在袁咸甫任校长期间，有一位教导主任谭晓凡，应该说是历届教导主任中最好的。他既平易又严格，是一位精明干练、善于言教、且善身教、在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好师长。每天早晚自习时，经常出入教室巡视督导，当时全体学生住校，晚自习后照例全校集合，由教导主任作一天学习生活小结。讲话内容丰富、简短精练，有批评，有表扬，有时还结合当代或历史名人的箴言懿行，对学生进行启发教育，具体生动，不拘一格，学生很爱听。他熟悉每个学生，在黑夜中，即使相距百步，看不到人影，只要听到说话，他都能听出是哪个学生，一时间传为美谈。当时学校文化生活也很活跃，每班有墙报，有时还加出画报，并将全校各班墙报中的优秀作品，按期汇编成册，定名为《披云汇刊》，用石印刊出。内有论文、散文、随笔、读书心得、新旧体诗词等，丰富多采，对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和兴趣很有帮助。在1933级中，有张书芬（舒焚）同学，天资高而学习勤奋，擅长绘画。曾有几幅画，登在墙报上，在师生中留下深刻印象。一幅是揭露蒋介石“新生活运动”的，画面上画着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蒋介石，伸出一双魔手，妄图阻止一列

向前飞驰的火车，并把一张写着“新生活”的标签贴在车头上。画题是：《开倒车》。一幅是描绘阴历十月初一民间闹鬼节，举办“盂兰盆会”迷信活动的，画题是：《盂兰会所见》。画了两个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的叫花子，吃力地抬起一张大鼓，一个彪形大汉正抡起鼓槌猛力擂鼓，震得两个叫花子东倒西歪，观者如堵。第三幅画的是《方城三大人物》。画面中间坐着国民党县长姬脉惠，左右两厢，一边站着教育局长袁襄家，一边站着县保安大队长栗某人。三个人物画得维妙维肖。这天，袁襄家正好从墙报前经过，对这幅画端详了又端详，也许觉得太象自己的尊容，笑哭不得。当时舒焚年甫十四岁，就能以如此犀利的目光洞察社会，以艺术的笔触针砭时弊，实属难得。舒焚1933年秋入学，这时学校已改名“简易乡村师范”，学制四年，但他只上到1935年“三上”，经过短短一个假期，就补习了初中三年的英语，考取南阳省立第五高中。抗战军兴，激于爱国热情，自动辍学投入火热的抗敌救亡运动。以后参加了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战演剧队六队，辗转安徽、山东敌后，历尽艰险，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自学成才，现在是湖北大学教授，著有《辽史稿》，主编有《汉语成语词典》，曾参与《汉语大字典》的编辑，并校注出版《襄阳耆旧记校注》等多部古籍。治学严谨，很有成就。至今虽年已古稀，仍矻矻终日，伏案不倦。

各班除办墙报外，还经常排演话剧，利用一些纪念日在城隍庙对过戏楼上公演。旧中国有数不清的国耻纪念，如五九国耻，五卅惨案，九一八事变等。遇到这些纪念日，学生们都要高呼“打倒小日本”的口号集会游行。有时还演出文艺

节目。对提高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，曾起到很大作用。袁广义做校长时，曾演出《木兰从军》，袁校长的妻子扮演木兰，受到观众欢迎。

方城师范的体育活动，也是很活跃的，特别是篮球队，在邻近几县颇有名气。象1932级的郭先欣（绰号小钢炮）、李子仪，1933级的翟化民、李华馨、石育才、郭德让、张晓光，堪称名将。方城师范的校队，曾参加在开封召开的华北运动会。先后在该校任教的体育教师王笑岚、许敬笑、孙兴甫，对培养这支校队，付出了很大努力。

1933年改为简易乡师前，校长袁咸甫离开学校，换了马承模。这个马承模不理校务，孤僻自是，财政不公开，教师发不出工资；不关心学生疾苦，对乡下来的贫苦学生不准自己做饭吃，为师生所不满。这年夏天，马承模携带妻子睡在学校当院乘凉，次日学生已开始早自习，夫妻俩还同床共枕熟睡，学生看不惯。一天夜晚，一些学生手持棍棒向其围攻质问，马承模自知理短，遂带上老婆翻窗逃往隔壁教育局。两天后，在教育局庇护下回校，立即开除了二十几名学生，为此引起学生罢课。县长姬脉惠亲到学校镇压，强迫学生复课。学生们走出校门四方呼吁，受到各界同情。当时音乐教师杨文洲已到国民党县党部工作，但和一部分学生仍保持密切关系，经常到学校来，暗中支持学生。结果上告河南省教育厅，经教育厅批准，将马承模撤职，被开除学生一律回校复课，另遴派教导主任王松峰接替校长职务，一场风波始告平息。这次学潮毫无政治背景，完全是学生反对校长渎职，最后，虽然学生胜利，但却耽误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学业。王松峰升任校长后，调整了教师队伍，加强了教学工作，学校在这

一阶段又有起色。

自从方城初师改为四年制简易乡师，到抗日战争开始时，共招收1933级、1935级、1937级三班学生。教学状况和教学秩序，时好时坏。特别有段时间，学校校长调动频繁，对校长位置，不断你争我夺，使教学大受影响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初，王松峰的校长位置，就曾被教师姬璐环夺去。王松峰被迫离校，姬璐环做了临时校长。1932级学生李振民等拥护王松峰，曾经运用法律手段向县政府告状，得到“批示”，王松峰由警察护送回学校，李振民等一部分学生站在学校门口高呼：“欢迎王校长回校！”王松峰和姬璐环各拉一部分学生，互相攻击，把一所好端端的学校弄得乌烟瘴气。不久，换了李荣庄做校长。又不久，又有张仲祺、袁广义、李士芳、丁约绪，他们走马灯似的，或正式任命，或暂时代理，调来换去。其中袁广义还曾和县长姬脉惠闹对立，姬脉惠要派自己的一个亲戚到学校任职，袁广义不买账，甚至在课堂上公然揭露姬县长，直至弄到《河南民国日报》发表消息支持袁广义。他们之间争斗的结果，受害的自然是学生。教师也是如此，换个校长就要换批教师。有些教师如裴佩青、卢品一，教学水平很高，不到一学期就走了；也有个别通过关系来混饭吃的，象音乐教师茹子高，同校长有点瓜葛，既不会唱，也不会弹风琴，唱奏起来总不合拍，实在混不下去，偷偷溜了。校长还为他圆场，说：“上南京了。”还有个国文教师李士英，是校长李士芳的弟弟，他连文章的语气都读不准，甚至把疑问句读成判断句。有一首《婉蓉词》，是写一个年轻妻子思念远在海外的丈夫的：“天昏地暗，美洲在哪边？！”他竟读成：

“天昏地暗，美洲在那边。”更胡扯孟子姓翟。笑话百出，不一而足。在师范教学时间最长，而又最有水平的老师，要数靳德甫，他从1929年到校任教，一直到1936年，达九年之久，以后还时断时续在校兼课。靳德甫，信阳人，北大毕业，参加过五四运动，学识极为渊博。不管是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数学，还是国文、英语，任何一门课，不用备课，随时可以上台讲授。讲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不看课本，背诵如流，讲析详尽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对学生要求不严，学生课外作业，他很少批阅，考试时很马虎，常常迁就学生。例如，出了一道“阳光能不能杀菌”的生物试题，他说道：“这道题好答得很哩！只用一个字。”一个字，当然是“能”。靳老师的课程，考试总是高分，于是皆大欢喜。但却误了学生。1932级毕业时，到南阳会考，许多学生对他讲的课考不及格，造成第二年补考。因此有些学生说，“当初对靳老师的宽松很喜欢，及至会考不及格，真想骂他一通”。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信哉斯言！

靳德甫的英语非常流利，标准伦敦音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，有个名叫伊法诺夫的波兰人来到方城。这人的身份弄不清，有说是学者，有说是记者，教育局为他在黉学大成殿组织了一场讲演会，请靳老师做翻译。师范学生都去听了。讲演内容，已不复记忆，只记得几句是：“中国现在不行”，“孙中山是个伟大人物，是中国的导师和希望。”靳老师翻译后，只听伊法诺夫用感叹的语气又说了一句什么，等靳老师翻译出来，原来是：“然而他死了！”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靳老师提出休息一下。伊法诺夫不依，坚持要等他讲完。靳老师用英语说：“我的舌头我当家。”说罢便

站起来走了。伊法诺夫强着自己讲下去，但他会的中国话实在有限，下边听不懂，会场秩序大乱。后来，靳老师休息完毕回到讲台，欲把讲演会继续下去。但不知怎的靳和伊用英语口角起来，听众茫然，经调解无效，靳老师拂袖而去，于是又请督学张仲奇继续翻译。学校有个黄建民老师，他说：“这种场合我绝对不去，谁知道他是流氓还是骗子”。不过，据靳老师回来说，伊法诺夫还真有点学问哩。伊法诺夫作为外国客人，当翻译提出休息时是应该同意的，只因外国人傲视中国人惯了，没料到碰上一个有脊梁骨的中国人，结果弄得自己丢了脸面。

靳老师原名鸿骏，读书时是高材生，他早期的一篇作文《张樵夫传》，曾被选在民国初年的《全国学生优秀作文选》里。一二·九学生运动后，学生普遍关心时事，靳老师平时只管教书，从不谈论时事，有一次突然谈兴大发，侃侃论起时局来，对蒋介石在日寇侵略面前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，盛赞冯玉祥的长城抗战和北方将领，而对蒋介石的嫡系极为蔑视。靳德甫这位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，意志消沉，后来又染上了鸦片嗜好，以至潦倒终生。

这里还应当提一下1937年在方城任教育局长的韩昕，项城人。此人虽对方城教育没什么建树，但总算有点学问。他著有厚厚一本《兴味主义教学法》曾向1935级讲授，常常运用他的“兴味”方法惹得全班哄堂大笑。

方城师范主要培养小学教师，但客观上也起着为国民党政府培养地方官吏的作用。在方城基层政权的乡镇长中，很多是历年毕业的师范生充任。有的还成了县一级军政人员。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，难以一概而论。有变得反动腐

朽的，也不乏有抱负的才能之士。如1925级的丁光宇，就属于反动腐朽一类。他曾任县财委主任、商会会长，乡下有良田，县城有商店，亦官亦商，极为富有。此人富而不仁，唯利是图。1940年春，小学生们进行抗日募捐，丁光宇不仅拒绝捐献，还侮辱学生，引起公愤。全城中小学生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，同丁光宇开展说理斗争，在众怒难以扼制的情况下。曾经捣毁了丁光宇的商店，高呼“打倒丁光宇”的口号示威游行，最后以丁光宇认输告终。丁光宇心毒手狠，人称“丁二铁匠”，他的同班同学金玉栋，就与他有所不同。金玉栋后来成了方城军界首领，曾任县国民兵团副团长（团长由县长兼任）多年。一次，他奉令逮捕我党党员刘毅然，由于地方士绅黄子昌的掩护，刘毅然安然出走，金玉栋便不了了之，并未追究。抗战胜利后，金玉栋率队进犯我军被俘虏，在受到宽大优待后，态度大变。释放回来，逢处说共产党的好话，从心底佩服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。我地下党的同志利用金玉栋的嘴作宣传：

“金玉栋亲身经历，亲眼看见，共产党如何好如何好。”从而大大消除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，在群众中所造成的对我党我军的疑虑。再如1929级的王炎升，就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。当抗日战争初起时，宛西别廷芳村治派势力向宛属十三县发展，王受别廷芳青眼，二十六岁就当上了方城联防司令，还应邀到内乡天明寺，对别廷芳的军政人员作批判汉奸汪精卫的报告。他曾设想在方城实行足食、足兵、足学，这在当时自属空想，但他走上仕途，还能做个比较清廉的官吏，在国民党时期，也算少有的了。以后他干过几任国民党县长，解放时参加起义，加入民革组织。现作为离休革命

干部，虽已耄耋之年，还孜孜不倦致力于《易经》研究。

方城师范在培养小学教师和地方官吏的同时，还造就出相当数量的革命者，这大概是国民党当局所始料不及的。在苦难的旧中国，青年学生普遍具有爱国热情，对于革命真理比较容易接受。远在1932年，当1929级毕业前夕，我们党的南阳中心县委，就曾派一位名叫惠子息的同志，以求学为名到方城师范活动。先后发展杨洪波、周奎先、高寿朋、郭明久、孟合三、马芳萼等人加入党的组织，一度建立起党小组。这些早期入党的党员，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，虽然绝大多数未能坚持下来，但毕竟在这座校园里点起过革命火种。而且在1937年秋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在民主革命高潮中，这火种重新点燃时，就烧得更旺，更红火了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1933级毕业后，学校只剩下升入三年级的1935级，和新入校的1937级两个班。这时“七七”事变已经发生，国共两党重新合作，抗日浪潮高涨，全体师生热血沸腾。新任校长张道生，教师崔祥甫、杨宣如、乔景楼，不管他们的政治背景如何，可以说全是积极抗战派。张校长每天早上亲自指挥，高唱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壮怀激烈。每天夜里还要派两名学生，到教育馆收音室，从收音机里收听半夜广播的纪录新闻，次早朝会时向同学报告战况。整个学校一扫争权谋私的旧风，出现了全新的景象。学生一面上课，一面还组成宣传队，走向街头、城郊，进行抗日宣传。师范学生的抗战歌声，响遍了校园，响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，到后来更响彻穷乡僻壤。1937级的赵树旺等，还演出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当时，老百姓们多把新闻说成“京报”，由于学生们经常上

街宣传抗日，报告时事，老百姓看到师范生，总爱问：“京里又来报没有？”在这期间使学生深受教育的，是国文教师杨宣如所进行的一次政治测验。其中有一题云：“抗战时期哪里最安全？”有说：“四川峨眉山最安全。”也有说：“不用跑那远，咱县七顶山后阴就怪安全。”同学们说了许多安全地点，杨老师笑了笑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都答得不对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：‘只有抗战前线最安全。’”他说：“只有坚持抗战，中华民族才能解放；只有坚持抗战，中国人民才能生存。不抗战，亡了国，逃到哪里都得当亡国奴，哪里还有安全之地呢！所以，我们应该想民族的安全，而不应该只想个人安全。”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，都说：“我们天天喊抗日，讲到安全，怎么净想个人呢？我们的爱国心哪里去了？”通过这次测验，懂得了许多政治知识和革命道理，政治觉悟大为提高。数学老师乔景楼，还个别找同学们谈话，帮助同学学习，启发革命意识，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信赖。后来才知道，杨老师和乔老师都是共产党，乔老师入党很早，他还是原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的入党介绍人呢！

1937年11月，南阳平津流亡同学会，派李柏（窦柏祥）、鄂继远先生来方城，到师范作报告，进行抗日宣传动员，随后又有安心义（道平）、刘岩、莫非（鲁勒）、李克相继到来，利用抗敌后援会的合法名义，组织抗敌宣传团，秘密发展党的组织。1935级学生侯万庆（义方）、张天忠、袁彭扶、李景白、杜运先、李喜运，1937级的靳元龙等，都成了宣传团的积极分子。宣传团曾在县城和券桥、赵河等乡镇巡回宣传演出，哄动了整个方城。农村大姑娘要求跟随宣传团去抗日，贫苦农民要求替他们作主斗恶

霸，对方城人民来说，真是一次亘古未有的民族民主革命大动员，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积极性。

这时学校已有党的组织，已有一些同学如侯万庆、李喜运、张天忠等被吸收入党。这年暑假，1935级的房锡华、周阿振在党组织领导下，还创办了石印的《建国日报》，他们冲破重重阻力，自编自印，自己发行，亲自到街头卖报。县委负责人安心义，还专门为报纸撰写纪念八·一三全面抗战的社评，颇有影响。

1938年初，师范校址被国民党军“五八”医院占据，便从城隍庙迁入书院新裕中学上课，并进行教学改革，由乔老师等开出了《游击战术》、《侦察与通讯》等抗日课程，体育课改为军事操练和演习，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战时学校。

这年秋天，国民党当局决定，简易乡师同私立新裕中学合并为县立中学，简师作为中学的一个师范部，学制不变，由原新裕中学校长李武乔担任校长。当时学生们依恋原来的校长和老师，反对合并。后经党组织做工作，介绍李武乔是抗日派，合并后对抗日宣传有利，力量会更大，大家才不反对了。

新学年开始后，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已告结束，转入党的地下斗争。1935级升入四年级，简称“师四”，支部就建立在这个班上，因为搞得很活跃，色彩较浓，被人称为“红师四”。先后入党的共有十四人，他们是：侯义方、张天忠、李景白、李喜运、杜运先、袁彭扶、房锡华、周阿振、鲁开泰、王庚山、耿青山、井国玺、权兆麒、杨鸿福。当时执行“六大”党章，候补期三个月，毕业前都已转为正式党员，由于这个支部的党员全是十几、二十岁的小青年，